

今年90岁高龄的学者许倬云先生,客居美国60年,零距离观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集成著作《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于近日出版。著者在书中深切剖析美国由盛而衰的现实,促使我们反思关于美国、西方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想象。

二十年来的美国

□朱云汉

许倬云先生是过去二十年来,给我授业解惑最多的长者之一。他经常让我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惊喜与感叹,他对世界史的宏大叙事让我视野开阔,他对四千年中国历史的通透解析让我茅塞顿开。

许先生坐卧匹兹堡河谷,胸怀人类,心系神州,观天察地,日夜匪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忧世、忧国、忧民,民胞物与。可能他也察觉到我这后生晚辈的身上也流露出些许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所以隔三岔五总可以接到他的视讯垂询,并与我分享他对时局世事的观察与感触。

许先生在美旅居六十载,早已他乡作故乡。美国既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观察现代西方文明的窗口,更是他剖析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根源之最大社会实验室。这本书既是一部客居生涯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剖析美国社会病理的诊断报告,更是一篇充满惆怅与悲悯之情的动人史诗,生动地述说着美国社会与政治体制为何一步步走向衰败。

他不仅仅与我们分享了他在美国一甲子的重要亲身经历,将他在美国客居生涯中印象最深刻也最值得回味的人、事、地、物生龙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透过他独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敏锐视角,帮读者还原这些偶然相逢的鲜活案例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并摆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他再把这些人、事、地、物在不同时期的面貌与本质变化放入一个全方位的历史分析框架中,从地理、文化、宗教、族群、产业、城乡、阶级、政治、军事到帝国事业各种角度,来试图回答一个所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几代华人留美精英心头的共同疑惑。

正如他在文中即兴叹道:“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在结语时他又反复自问:“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在许先生的字里行间,我能充分感受与体会他的沉重心情,因为我们这几代留美的知识分子,都曾被美国的开放制度与自由风气吸引,都曾被美国的物质繁荣、经济活力与国际领导威信折服。与许先生一样,当我在为美国社会与政治衰败走势把脉时,都是抱持一种哀矜勿喜的心情。美国的衰败不仅意味着整个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将失去最重要的支柱,也可能触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正如美国决策者总是怀疑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我们也需要担心美国是否能和平衰落。

我在1981年夏初次踏上美国,要比许先生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当我开始有机会亲自观察美国时,水门事件对政治体制合法性造成的伤痕已经逐渐消退,但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重创仍待修复,里根正以扭转停滞性通货膨胀为职志,开始在美国社会推行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

这场高举市场万能而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思维变革,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浪潮不但将寻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推广到所有西方国家,也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人为障碍。一场由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驱动的超级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到地球的所有角落,全球生产分工模式

与产业供应链也快速全面重组;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精英与超级富豪阶层也顺势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凌驾政府,支配社会游戏规则,并一步步地肢解意在保护弱势群体、劳工与中产阶级权益的经济管制措施与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排斥任何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法律与国际规则,也可以左右国际货币基金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与政策。

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恶果。新自由主义革命让国家机构逐渐丧失扭转资本主义下所得分配趋向两极化的能力,也逐渐失去维护弱势团体享有社会晋升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市场参与者基本权益的能力,更失去节制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与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在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可以驱动大律师事务所、大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公司等机构,与依靠企业主捐赠的东西两岸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计,并引导舆论。这导致过去三十年美国的产业结构愈来愈集中化,强者恒强,大者恒大,垄断资本横行。这也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与寻租。

自由主义革命带来的政策变革,也必然导致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之分配严重不均,如今众多西方国家正面临全球化受损者的猛烈政治反扑。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道路上走得最远,长期由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更不断为富裕阶层打开金权政治洪流的闸门,因此美国社会所累积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最严重,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趋近停滞的问题也最为突出,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最终以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人物而得到暂时的宣泄,但也为今后美国社会更严重的撕裂埋下了伏笔。

特朗普可以获得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因为这批选民迫切需要知道:未来足以维持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哪里?政府何时才能大幅更新残破不堪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与社会晋升机会?婴儿潮世代大批退休后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能否支撑?如何扭转过去三十年富者愈富而中产阶级趋贫的两极化趋势?

……

我的上述观察,也仅仅是帮许先生的社会病理诊断提供一点脚注。新自由主义思维颂扬个人自由,但也同时奖励自私、自利与贪婪,并鼓励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美国富裕阶层的所得税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而且跨国企业都尽可能将利润隐藏在国外租税天堂,他们自私自利到连最基本的社会义务都设法摆脱。这正好可以印证许先生所指出的:“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现在,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



《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
许倬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叶永烈在第一次投稿的投稿箱前留念

用书信见证历史

□叶永烈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年,11岁的我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尽管信末只是盖着编辑部蓝色的长方形图章,没有留下编辑的名字。在30多年之后,我正是凭借这封信的笔迹,找到了责任编辑——我的启蒙恩师、散文作家杨奔先生。

早年,我跟科学界的交往相当密切。真是不查不知道,光是写信给我的院士,就有20多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院士,诸如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遗传学权威谈家桢,“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等,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院士、考古学权威夏鼐院士等。

华罗庚院士写给我的信夹着文言,但是字东歪西倒,他自谦是“蟹爬字”,然而苏步青的字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夏鼐院士的信用毛笔竖行写在花笺上,千家驹院士给我的信则成了“无字天书”——他为了快捷,写好信用传真机给我发来,如今褪色成了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留了复印件,字迹如新。张存浩院士在1979年11月22日、1981年

7月27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了他的姑父傅鹰院士怎样花费多年心血培养他,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傅鹰院士的深沉真挚的敬爱之情。

文学界的书信更多,我保存着冰心、徐迟、柯岩、秦牧、柯灵、秦瘦鸥、陈伯吹、流沙河、戴厚英等的书信,他们都是文坛名家。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年的

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三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oogle(谷歌)地图。他在图旁写了一句话:“我年老力衰,很难走访,您是小伙子,倘便道经过这里时,欢迎下顾!”

在秦瘦鸥先生的眼中,我是“小伙子”,而“世纪老人”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留言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称梁实秋为“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我原本以为,在作家之中,写信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底的大约只有我一人,谁知在拜访冰心老人时得知她也如此。她说她“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以便编文集时收入。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草书信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之美。出人意料的是,

乒乓球“三连冠”庄则栋给我的信,也是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用语富有古文韵味。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宾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美,足见文学功力之深:“手书并《今晚报》奉到,谬承笔底春风,并拟推爱及于海外,感刻之余不胜惶惭。”“囑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是绝对可靠的。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也非常认真,在校对我的《钱学森》一书时,极其仔细,修改之处不是随手画一道线,而是用尺画出笔直的线。他俩可谓得乃父之“真传”。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在1980年、1981年给我的两封信,也极其认真,其中一封信长达2000字,为的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两处错误。他的这两封信,足以列为中共党史文献。

我收藏的最“花哨”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卡通贴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读来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她是台湾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作为《梁实秋与韩菁清》一书的序言。

在整理书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华无线电器厂厂的信,写于1979年2月15日。这封长达千字的信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写来的,由于信中讲述自己在业余创作的遭遇颇为感人,我当时不仅回信鼓励,而且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此人便是郑渊洁。他后来经过努力,成为蜚声文坛的“童话大王”。我想,今日郑渊洁倘若见到此信,一定会向我索要复印件,而且会收入文集。

还有一封1979年4月9日的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尚未出道的年轻人,跟我商谈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为电影剧本之事。信共三页,我也保存了此信。此人便是梁晓声,后来成为名作家。

艺术名家给我的信也不少。老音乐家贺绿汀、“三毛之父”张乐平、漫画家方成、电影演员程之、电影导演张建亚、“二胡女王”闵惠芬等都与我有许多交往,因而也都留下了书信。尤其是张乐平,他画《三毛学科学》时,找给我出点子,所以来往较多。1988年中秋节,我去看望张乐平时,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欣然用毛笔画了一幅三毛像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中。

钢琴家傅聪从英国写给我的信,钢笔字很潇洒。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从美国给我写信,钢笔字则显得端庄。

由于我后来的创作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文学,采访众多政坛名人,也就收到诸多他们的书信。其中即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毛泽东侄子贺龙成、陈云夫人于若木、方毅夫人殷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等。我多次到北京刘松林家采访,而她也曾三次来到上海我家看望。我也曾多次采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她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其中有一封信,信纸很薄,皱巴巴的,差一点被我当作废纸扔掉,细细一看,竟是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78年9月2日的信,谈了关于艾思奇这个名字的三种说法,极为珍贵,赶紧放进了文件夹。